

上海市银行业内部控制系统评估研究*

冯小兵¹ 黄烨菁² 连 微³

(1、3. 上海外贸学院金融学院 200335; 2.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200020)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对上海银行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定量的方法评估了上海地区商业银行业内部控制系统完善性。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将以以往的定性描述方法加以改进, 设计了融合客观描述因素的评估方法, 构建银行内部控制完善性的指数, 成为判断银行内部控制系统完善性的科学测评方法。考虑到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管理模式上的差异, 论文在测评上海地区两类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完善性总体指数之外, 进一步对两类银行内控完善性指数加以分解, 考察两者差异的具体来源。结论表明, 构成数据样本的两个银行群体中, 国有商业银行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具有更高的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 总体的内部控制完善程度更高, 经指数的分解可以看到这一水平高水平的内控完善性的来源。文章最后分析了银行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的成因并提出了强化内部控制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 内部控制完善性 现场调查 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 F832. 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1309(2012) 1 - 0086 - 011

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是保障银行安全稳健运行的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目前中国银行日益凸显的风险管理领域是一个重要课题。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进程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 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内融资的主要渠道, 加强该体系的稳定性, 最大程度降低内控体系失效而导致危机的可能性是银行业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此背景下, 评估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是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主题。目前对于银行内部控制完善性的指标研究大多基于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 而针对中国当地商业银行特点和现状的研究则非常欠缺。在现有国外成熟经验基础上, 结合上海地区商业银行的特点设立一个评估内部控制系统完善性的方法和指标无疑是一个具有很强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 对于科学地认识银行系统的安全性, 并对改善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具体措施有指导作用。

1 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银行的内部控制的内涵是保证一个银行实现其经营目标所采取的任何管理性行为过程, 内部控制的目标涉及经营的有效性和实现目标效率的高低、财务报表的可靠性以及合法合规性, 内部控制的过程自上而下包括银行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基层员工。这个解释作为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比较权威的界定, 最早由美国赞助组织委员会(①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提出来, 这个组织早在 1992 年就提出了美国银行内部控制的界定, 在业内被认为是较权威的解读, 大部分银行都借鉴该组织的相关文件来理解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而此后, 英格兰威尔士注册会计师机构(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简称: ICAEW) 组织了以尼格尔·特恩布尔(Nigel Turnbull) 为主席的十人工作小组, 出台了相关文件, 结合英国银行业的发展情况对银行内部控制系统加以深入的阐述, 在英国金融界内被称为特恩布尔报告(即 Turnbull Report) ②, 该报告较系统地提出了如何理解一个完善的银行内部控制系统, 认为银行内部控制高度融入银行日常运行, 并且是银行管理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完善的银行内部系统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它能够快速应对公司经营中发生的各种风险, 它还应

收稿日期: 2011 - 12 - 21

*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支持的金融学重点学科项目的资助(项目编号: J51201)

该能够快速应对商业环境的各种变化；其次，它应该能够快速报告及合理处理任何控制失误和缺陷，提供相应的弥补措施。

此后，相关的机构和专家进一步关注如何衡量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完善程度根据之前的研究成果，由于美国的银行业比较发达，美国赞助组织委员会根据对美国当地银行业的考察，提出了银行内部控制系统完善性的评估方法，设计出从多个方面测定内部控制系统完善性的框架，该框架后来被国际清算银行用作衡量一个国家整个银行系统完善性的基本工具。后来的研究都普遍借鉴这个分析框架评估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投资机构的内部控制完善程度，美国学者应用这个方法对相关机构的测评结果基本与现实情况一致，回顾过去十年美国银行的内控系统完善性，发现在《2002 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③出台以前，美国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完善性存在明显缺陷，即内控系统完善性是较差的，事实上，在这个针对内部治理和完善信息披露的法律之前，以安然公司为代表的若干个大型美国投资机构的确长期存在内控系统不健全的种种问题（Ashbaugh — Skaife, H. Collins and D. , Kinney, 2007），这些因素都与之后发生的公司管理失控有关，而研究结果中对当时内控系统完善性指数的测评也的确显示其内控完善性指数很低。

国外文献涉及中国内部控制问题几乎很少见。我国学界对特定组织的内部控制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有比较系统的学术研究，文献比较有限。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比较笼统地对企业、事业结构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介绍与存在问题的分析，主要用定性方法分析相关行业的内部控制概念、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陆磊，2006；孙进，2009；徐紫娟，2007），以及对一般意义上的内部控制理论产生与发展的介绍与回顾（孙立国，2011）。而对我国银行内部控制问题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是一个冷门问题，相关的学术文献很有限，银行内部控制一直是作为金融机构管理实务在管理理论的范畴下就管理手段加以研究，对银行内部控制问题本身的测评非常少，在 2007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这个问题逐步受到重视，我国学者开始就我国银行内部控制的种种现状着手分析，通过内部控制的特征、形态作定性的分析，涉及的概念也大多参考美国赞助组织委员会制定的内控系统完善性的评估框架，（王汉金，2009；韩静怡，2011；兰柏超和陈晓慧，2011），在描述现状的基础上，得出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低效的结论，并提出加强风险导向的内控机制的建议。

总结起来，对银行内控问题的研究还属于一个新领域，前期的成果非常有限，总体上对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判断是认为存在着风险的，本文的研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商业银行内控的具体现状，深入研究无疑需要选择具体对象，这里选择上海地区的商业银行，对内控完善性作科学的测评，得出的结论将有助于丰富银行内部控制问题研究的文献。

1. 2 研究方法的创新——内控系统完善性定量指标的设定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不同于以往的定性分析研究，而是构建描述银行内部控制是否完善的数据，尝试以定量的方面更加客观地加以评估，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往国外学者也对类似研究主题主体作过分析，其评估方法的本质是相对简单的频率测量，该方法实际上是借鉴了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贸易限制测定方法的一种评估方式，最早由学者 Hoekman 于 1996 年从国际贸易领域引入到银行业特定系统评估领域。在此之后，由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阿德莱德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对银行的测评指标作了更具体的设计和分解，提出了多层次的测量指标（McGuire and Schuele, 2001 年；Dee, 2005）。

① 美国赞助组织委员会 COSO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COSO) 是专门研究内部控制问题的非营利性结构。1992 年 9 月, COSO 委员会发布《内部控制整合框架》(COSO - IC), 简称 COSO 报告, 1994 年进行了增补。

② 1999 年英格兰威尔士注册会计师机构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简称 ICAEW) 组成的以尼格尔·特恩布尔 (Nigel Turnbull) 为主席的十人工作小组公布了《内部控制: 综合准则董事指南》, 即特恩布尔报告。作为指导企业构建内部控制的指南, 该报告的意义在于, 为公司及董事会提供了具体的、颇具可行性的内部控制指引。

③ 《萨班斯法》是继 2000 年到 2002 年安然、世通等上市公司纷纷暴出丑闻后, 为强化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和增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而出台的一部重要法律。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 该法均是在《美国 1933 年证券法》和《美国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的基础上, 根据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现实需要, 对公司治理和会计审计进行的新的调整和规范。布什总统在签署法案时, 称“它是美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而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它是继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 美国政府制定的涉及范围最广、处罚措施最严厉且最具影响力的公司法律。

其后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来自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团队对上述指数评估方法提出异议,认为该方法中的指数是以主观判定准则来判定各个指标的权重,不够严谨,提出的改进方式是引入统计学范畴内的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①重新确定权重,从而获得包含客观评判因素的指数(Diehl and Kalinov, 2004)。因子分析法在类似的指数设计中有比较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对于指数构成中权重的选取应用到这个方法(Diehl and Shepherd, 2007 年; Nord? s and Kox, 2009; Feng, Hu and Wang, 2010)。

本文对银行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的测定基本上应用 OECD 研究报告的思路,并结合上海商业银行的制度特点和发展现状作了调整,考虑到银行机构的具体情况,所做的调整包括:第一,在贸易限制指数的评估中,贸易限制指数的打分仅有两个分数:“0”表示有限制,“1”表示没有限制,对应于贸易限制情况仅有的“有”或者“没有”两种特征,然而银行内部控制问题相比更加复杂,通过调研我们将影响内控完善程度的各项内容加以分解,把相关特征细分为“完全实现”、“部分实现”和“没有实现”,相应的分值分别是 100%, 50% 和 0%,虽然从理论上还可以对此加以细化,但是基于信息处理的便利性,这三个选项设计是最为恰当的。第二,在贸易限制指数的构成中,影响贸易限制指数的若干因素没有作进一步的分层,但本文对于银行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的组成元素作了分层,根据银行内部控制理论以及实地调研的情况,归纳出银行经营活动中影响内控完善程度的五个方面,分别是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以及监测。第一个方面“控制环境”再细分出 6 个子因素,这 6 个子因素各自还包含若干影响因素,构成二级因素(详见附录¹2)。由此,我们设计了公式(1)和公式(2),分别如下所示。将公式(1)得到的结果再运用到公式(2)中,计算得到“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Internal Control Soundness Index, 简称 ICSI)。

$$\text{Envioronment Composite Index} = \sum_{j=1}^6 \sum_{i=1}^I \text{Score}_{ji} \times \text{Weight}_{ji} \quad (1)$$

公式(1)中,j 指“控制环境”的 6 个子因素;这 6 个子因素还可以分解出多个二级因素,即“子子因素”,用 i 来表示;Score_{ji}:指“控制环境”下各子子因素的打分;Weight_{ji}:指“控制环境”下各子子因素的重要性评分(即为权重),与 Score_{ji} 相对应。同理,应用公式(1)对 ICSI 指数包含的另 4 个因素的中间指数加以计算,代入最终的 ICSI 指数计算公式内(公式 2):

$$\begin{aligned} & \text{Internal Control Soundness Index} \\ &= \sum_{n=1}^5 \sum_{m=1}^M \text{Intermediate Index}_{nm} \times \text{Weight}_{nm} \end{aligned} \quad (2)$$

公式(2)中,n 指影响 ICSI 指数的 5 个因素,每个 n 对应的 m 值不同;Intermediate Index_{nm}:为 ICSI 包含的 5 个因素的中间指数;Weight_{nm}:为 5 个因素各自中间指数对应的权重,与 Intermediate Index_{nm} 相对应。

2 研究方法的设计与主要步骤

由于银行内部控制问题涉及银行经营和内部管理的所有方面,需要深入到两类银行内部对经营情况作全面的了解,我们的研究团队采取了现场模式的调研方法,选择调研对象的办公地点在现场作人员访谈,请受访者当场填写问卷,以确保受访者在充分理解问卷的情况下作完整的回答。

2. 1 数据采集的设计与方式

① 因素分析法的依据是把一组反映事物性质、状态、特点等的变量通过求特征根简化为少数几个能够反映出事物内在联系的、固有的、决定事物本质特征的因素。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将形成指标的大量因素简化为关键的若干个因素,该方法同时提供了简化后因素的重新得分值。

基于美国赞助组织的相关研究报告包含了评估银行内控完善性的问卷，我们借鉴该问卷的核心内容，结合上海银行业的发展特征对问卷加以调整，构成评估上海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内控完善性的问卷（见 96 页附录 2）。

由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在上海整个银行系统中占了 73.4%，是上海本地银行的主体，我们的研究选择这两类银行为研究对象。根据银行分布网点，我们在全市区分出二十多的地区，在每个地区选择了 10 家国有商业银行和 15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总共有 500 家银行成为该研究的调查对象。调研问卷有 53 个问题，涵盖了内部控制的 5 大因素，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以及监测，相关问题从不同角度测度五个方面的特征。问卷调研方式是现场互动式的，并配合互动式面谈，目的在于当受访者对部分问题有疑问时，我们课题组当场予以回答和解释，从而保证受访者顺利填写和百分之百的问卷回收率。

2011 年 1 月，我们选择了五家银行作为对象开始第一轮调查。通过或现场互动式回答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100%。考虑到影响银行内控程度的五方面经营特征与银行所有部门运行都相关，我们邀请的受访者来自银行的每个部门，既有部门的管理层也有普通员工，两者比例相当，使得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更具普遍意义。通过汇总与比对不同部门不同职位的受访者的回答，我们确定了两类银行有代表性的受访者范围。

2011 年 3 月末、4 月初我们进行了第二轮调研，问卷由上一轮问卷调研确定的代表性受访者填写，每家银行均有 10 位员工参与调研，既有银行各职能部门的经理也有基层员工，共获得有效问卷 5000 份，从而获得与银行内部控制系统完善性测评相关的信息。

2. 2 数据分析与解读

问卷中各个问题的回答采取打分制，是内控完善性指数包含的各个部分，受访者对此给出分值体现了每个部分在各自银行内部实现的情况，反映出指数各个因素的完善程度的高低，而各个组成部分的权重是由受访者根据其对各综合指数组成部分的重要性的主观评价，体现了个人主观上对银行内部控制现状的评估。中间指数是按比例得到的加权平均数，可用来评估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公式（1）和（2）即反映了该评估的过程。

在评估方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对内控完善性指数内各个子因素的权重作客观处理，我们分解出五类子因素，通过问卷信息从受访者那里获得主观判断确定的权重，同时我们采用因素分析法得到更为客观的权重，对两者加以处理得到最终的权重，较好地避免了权重分配受访者的主观影响，使得最后的指数更加客观和科学，更准确地体现银行的内控完善程度。论文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采取因子分析法来确定的权重具体值，最后我们实际使用的权重是问卷调研所得的主观权重和因子分析统计法获得权重的简单加权平均数。结果如附录 1 中的表 1、表 2 中所示。

论文采用的因子分析方法，取决于数据是否通过适应性测定，因此，我们首先对样本中的数据进行 KMO 检测（即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即 Bartlett tests of sphericity）。经测算，论文的样本数据通过了 KMO 测试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见 96 页附录表 1），表明该样本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法的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获得上海市商业银行的总体指数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各自的内控系统完善性指数（见表 1 与表 2），表中给出了两类银行各自的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以及还包括内含的各个子因素的中间指数。

表 1 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 (ICSI) 与五个子因素中间指数

评定内容	得分	权重	中间指数	ICSI
控制环境	1. 诚信与道德	7.41	0.43	
	2. 专业能力水平	8.33		
	3. 董事会与监测委员会	5.93		
	4. 管理理念和经营风格	7.33		
	5. 组织机构	6.11		
	6. 人力资源政策和实施	8.33		
	控制环境综合得分及权重	7.24		
风险评估	6.67	6.17	0.41	
控制活动	10.00	6.17	0.65	
信息和沟通	6.67	6.33	0.47	
监测	7.78	6.61	0.51	
ICSI				0.46

注:中间指数是 5 个因素各自的加权平均;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ICSI)是该 5 个因素的加权平均值。

表 2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 (ICSI) 与五个子因素中间指数

评定内容	得分	权重	中间指数	ICSI
控制环境	1. 诚信与道德	7.96	0.49	
	2. 专业能力水平	7.50		
	3. 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	6.11		
	4. 管理理念和经营风格	7.33		
	5. 组织机构	5.56		
	6. 人力资源政策和实施	5.42		
	控制环境综合得分及权重	6.65		
风险评估	8.33	7.42	0.63	
控制活动	6.67	6.67	0.46	
信息和沟通	6.94	7.17	0.52	
监测	5.56	6.06	0.34	
ICSI				0.49

注:中间指数是 5 个因素的各自的加权平均;ICSI,即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是 5 个因素的加权平均值。

由表可见,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ICSI 值分别为 0.49 和 0.46,显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内控完善值高于国有商业银行。为了对两类银行相关指数的构成情况加以描述,进一步测度该指数所包含的五类因素的得分、权重,根据这五类因素构成的中间指数,描述内控完善性差异的具体来源(见图 1、图 2、图 3)。

考察两类银行内控完善性差异的来源。根据相关结果,国有商业银行“控制活动”因素的得分为 10,相比其它几个因素得分都高,“监测”和“控制环境”的得分仅次之,分别为 7.78 和 7.24^①。与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对照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内控完善性指数经分解,得分最高的是“风险评估”,为 8.33 分,其次是“信息和沟通”,为 6.94 分,得分相对较低的是“控制活动”和“监测”这两个因素,两项得分分别为 6.67 和 5.56。

图 2 内各个因素的权重高低显示，五个因素的权重高低基本上与该项因素的得分高低是一致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受访者认为“监测”和“控制活动”这两项较为重要；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受访者更偏重于“风险评估”和“信息和沟通”。

将上述五项因素的得分和权重加以综合，构成五个因素的中间指数（图 3）。可以看到，在国有商业银行内控完善性五个因素中，“控制活动”和“监测”的中间指数最高，而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风险评估”和“信息和沟通”两项的指数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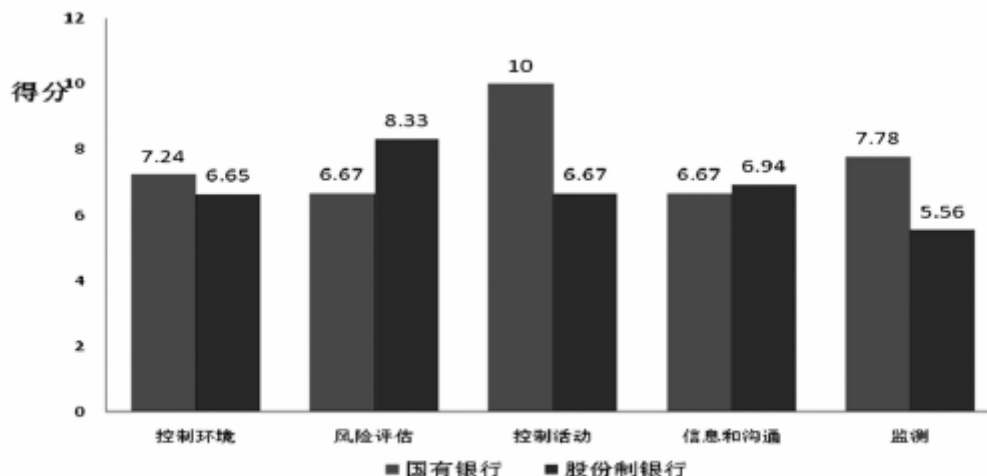


图 1 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得分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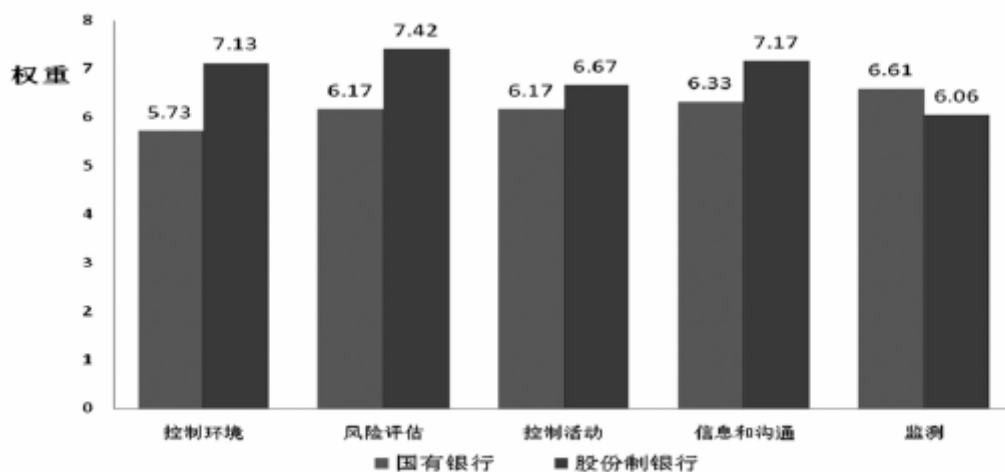


图 2 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权重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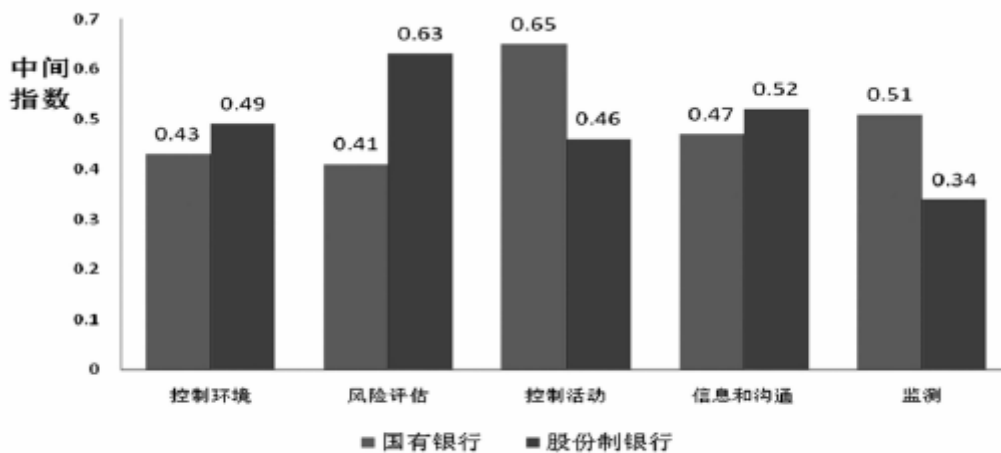


图3 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中间指数对比

上述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两类银行的经营治理模式和管理风格上的不同，在国有商业银行中，“控制活动”和“监测”活动更容易得到从上到下的严格执行，这两个因素相比于其他因素，体现了它作为国有银行受上级主管部门干预较大的治理特点，这与国有商业银行更多承担政策性业务的经营特征相关，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显然在管理手段上带有更强的集中色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风险评估”和“信息和沟通”两类因素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指数更高，这两类因素更能体现银行经营制度中的自我约束，这与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强的市场化特征密切相关，由于政策性业务较少，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风险控制更加重视，由此形成更缜密的风险控制模式。这两类因素在分、权重和中间指数上的差异原因。总体上看，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内控完善性，中国银行的内部控制完善性指数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①，低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4 回归分析

为了探求导致内控完善性差异的具体原因，我们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索形成内部控制完善性高低的原因。我们根据调研内容，归纳出影响银行内控完善性的回归分析模型（见公式3），该表明：影响内部控制完善性的因素包括所有制属性、是否上市、股权结构中国有股和外资股分别所占的百分比以及银行总资产四个因素，（在公示中 stateownership 变量所有制属性，是虚拟变量吗？foreign share 变量代表股权结构中外资股所含比重 flotation 变量代表是否是上市企业，用 1 代表已经上市，0 表示未上市，size 变量代表银行总资产。）银行的总资产采用该银行 2010 年公布的会计报表中的数据。

$$ICSI = \alpha_1 \text{Stateownership} + \alpha_2 \text{Foreign} + \alpha_3 \text{Flotation} + \alpha_4 \text{Size} \quad (3)$$

由表 3 的回归结果可知，银行的“国有持股”、“外资持股”和“资产规模”在银行的内部控制中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有正的影响，也有负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stateownership、flotation 和资产变量都是正向作用于银行内控完善性的变量，其中“资产规模”的影响最小，而“外资持股”变量则是负向地影响银行内容完善性，表明引进国外合作伙伴对于内部控制的完善无积极作用。

^① 根据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的研究，澳大利亚的国立澳洲银行（national Australian bank）的内控指数为 0.821，资料来源：<http://www.pc.gov.au/>。

表 3

公式 (3) 的回归结果

	Coefficient	Standard Errors
state wnership	0.0681 [*]	0.0044
Foreign Share	-0.1875 [*]	0.0053
Flotation Dummy	0.1212 ^{**}	0.0645
Size	0.0555 [*]	0.0044

注: (1) * 符号表示重要性水平为 5%, ** 符号表示重要性水平为 10%

(2) 相关银行的所有权结构信息摘自各个银行公布的年度会计报告。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与以往文献以定性分析为方法的研究不同, 本文就上海地区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系统完善性以定量的方式加以测评, 研究对象选择了上海商业银行最重要的两个主体: 即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通过测度两者的综合指数以及各自包含的五个因素的中间指数, 分别评估两类银行内控完善性。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借鉴了前人的方法并加以改进, 综合了大规模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而获得数据, 在确定内控系统完善性构成因素的基础上, 设计银行内控系统完善性指数的构成内容, 科学地评估两类银行内部控制系统完善性。相关的方法改进体现在综合了原有的主观判断法和因子分析法, 从而更为科学地测度各个指标的权重, 实现了主观判断和客观评估相结合的目的。

研究结果显示, 上海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情况较上海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好。主要原因包括: 上海国有商业银行在运作机制上包含更多的政府因素, 政府管理部门的影响较多渗透到银行的管理制度和模式中, 相应的组织结构更强烈地体现自上而下的强控制, 因此在“控制活动”和“监测”两个方面上, 国有商业银行要强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成为银行内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权力分散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注重“风险评估”与“信息和沟通”这两内控系统成分的建设, 这两个方面能有效地从微观个体层面得到贯彻, 符合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体制特征。

虽然, 本文的研究属于涉及银行内部管理的一个具体问题, 但是其研究方法结论对于金融机构管理的理论发展有一定贡献, 由于特定问题的前期成果非常少, 因此本文研究相对的创新程度较难下结论, 但对我们深入而客观地认识不同类型国有银行的内部控制无疑是有价值的。

将论文的结论结合国内商业银行目前的内部管理, 有如下政策建议。总体上看, 银行需要进一步加强自下而上的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整个中国的银行系统的主体, 必须强化自身管理层在业务运作中的风险意识和防风险手段, 从根本上避免来源于操作层面的银行危机。从访谈中得知, 银行管理层团队整体的风险控制意识不强, 需要通过人员培训、定期会议, 提高基层员工的风险意识和信息沟通能力,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业务规模低于国有商业, 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 是上海银行系统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股份制银行进一步提高内控完善性的政策建议是, 由于股份制银行指数构成中风险评估因素较为突出, 而“控制活动”和“监测”两项相对较弱, 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管层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到银行内部垂直型治理模式的制度建设中, 强化对各部门运作情况的监测手段, 从而推动个银行内部控制完善性的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 Ashbaugh-Skaife, H. Collins and D. , Kinney (2007) “The Discovery and Reporting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prior to SOX-mandated Audi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 44, pp. 166 — 192.

2. Basu, S. , Hwang, L. and Jan, C. (2000) “Differences in Conservatism between Big Eight and Non-Big Eight Au-ditors” Working Pap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nd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Hayward.

3. Doyle, J. , W. Ge, and S. McVay (2007) “Determinants of Weakness in Internal Controls over Financial Repro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4, pp. 193 — 223.

4. The AICPA Audit Committee (2004) “Internal Control: A Tool for the Audit Committee”,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Inc. , New York.

5.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2005) ” Internal Control: Revised Guidance for Directors on the Combined Code” FRC, London.

6.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98) “Framework for the Evalu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asle.

7. Bambrough. R (2010) “Reporting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Have Things Changed After the Initial Section 404 Surge? ” Post doctoral research paper, Warrington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Florida-Gainesville.

8. Dee, Philippa. 2005a. ‘A compendium of barriers to services trade’, research prepared for the World Bank.

9. Diehl, Nora and Kalinov, Blanka. 2004. ‘Services barriers and their economic impact: Examples of banking and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 selected transition economies’, OECD Trade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7.

10. Diehl, Nora and Shepherd, Ben. 2007. ‘Modal estimates of services barrier’, OECD Trade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51.

11. Feng, Xiaobing, Hu, Haibo, and Wang, Xiaofan. 2010. ‘The topology of a local trade web and impacts of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C, 21(7) : 853 — 866.

12. Hoekman, Bernard. 1996. ‘Assessing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in Will Martin and L. Alan Winters (eds.) ,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56 — 182.

13. McGuire, G. reg. 1998. ‘Australia’s restriction on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Pap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Canberra.

14. McGuire, Greg and Schuele, Michael. 2001. ‘Restri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banking services’, in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Tony Warren (eds.) , Impediments to Trade in Services: 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Routledge, New York: 201 — 214.

15. Nordas, Hildeguun Kyuik and Kox, Henk. 2009 ‘Quantifying regulatory barriers to services trade’, OECD

16. 韩静怡. 论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现状及对策, 环渤海经济瞭望, 2011 年第 6 期.
17. 金娟. 营造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文化氛围. 金融经济, 2010 年 14 期.
18. 兰柏超 陈晓慧, 风险导向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模式研究, 2011 年第 6 期.
19. 陆 磊. 建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 公用事业财会, 2006 年第二期.
20.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金融培训中心 — 甫瀚咨询公司.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内控调查研究报告. 2006 年 10 期. <http://wenku.baidu.com/view/2809868da0116c175f0e48d6.html>. 2011 —4—22.
21. 师 巍. 我国内部控制研究述评. 现代会计, 2006 年第四期.
22. 孙立国. 内部控制的含义、产生及发展. 现代会计, 2011 年第三期.
23. 孙 进.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初探, 财经界, 2009 年第六期.
24. 王汉金.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与制度研究, 武汉学刊, 2009 年第四期.
25. 徐紫娟. 建立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探讨, 技术监督教育, 2007 年第一期.
26. 袁新文. 加强商业银行内控评价. 上海金融报, 2004 年 07 — 22 期第 006 版.

《上海市银行业内部控制系统评估研究》附录

附录 1:

表 1 KMO 和 Bartlett 测试结果

KMO measure		0.602 > 0.5
Bartlett's test	χ^2 Square	32.170
of Sphericity	Significance	0.000 (significant)

注:1974 年 Kaiser 提议 KMO 统计量应大于 0.5,表明因子分子对样本是适用的。Bartlett 检验试验了原始矩阵恒等的无效假设。由于我们希望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需要小于 0.05 的重要性数值。

表 2 差异解释

Component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F1	3.695	61.281	61.281
F2	1.060	20.032	81.313
F3	0.957	18.6890	99.002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提取。

附录 2 从略,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